学習時報

STUDY TIMES

2015年9月28日 周一/四出版 | 第818期 | 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 网址:WWW.STUDYTIMES.CN 报名题字: 江泽民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37 代号:1-267

重要言论

国与国之间的确存在相互不理解的问题，但这就是生活。既然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制度、发展水平、生活方式，那就肯定会存在一些相互不那么好理解的事情。但是，一切看上去不可理解的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要想去理解并努力去理解，而不要排斥。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本国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保护 利用 传承 发展

——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励小捷答本报记者问

高层访谈

□ 本报记者 李玉梅 范 伟

记者：励局长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保护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和批示。首先请您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励小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他多次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的系列重要论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信，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为新时期文物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身体力行、一以贯之，为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做出了表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关键在于领导重视，关键在于落实各级政府的主体责任。

记者：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文物，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实物见证。加强文物的保护与管理，是文物工作的首要任务。那么，近些年来，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都取得了哪些方面的进展？

励小捷：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

各级政府认真履行文物保护责任。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文物保护法，把文物保护逐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领导责任制，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文物工作的政策措施。北京、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市将文物保护作为领导班子绩效考核的内容之一，纳入考核指标。

文物保护经费大幅增加。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将文物保护纳入财政预算，并逐年加大文物保护经费投入力度。1995年至2011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文物保护资金283.6亿元。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文物保护资金428亿元，2012年128亿元，2013年140亿元，2014年160亿元。

文物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十二五”以来，组织修复濒危馆藏文物24000余件。可移动文物的预防性保护从无到有，两年实施预防性保护项目108个，每年投入超过7亿元，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十二五”前4年实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3208项、文物安防工程1012项，编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335个，推动各地划定了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水下文物保护工作实现突破。现代科技被广泛用于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

考古发掘取得一批新成果。基本建设考古有力配合了国家基本建设，抢救保护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像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南水北调、高铁、高速公路、城市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等。早期遗址的重要发现，推进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边疆民族地区考古发现，进一步理清了区域文化发展脉络和古代各民族文化交流情况。

文物保护理念的坚持与创新。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在借鉴国外经验和我国文物保护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些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比如：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的要求；可逆性、可识别性原则，等等。随着文物保护对象和类型的不断拓展，文物保护工作重点的调整和社会对文物利用的强烈需求，我国文物保护的理念在坚持和传承以上原则的同时，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创新。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由注重抢救性保护为主向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由注重单体文物保护向注重集中连片和整体环境风貌保护转变；由以传统工艺保护为主向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保护转变；由突出保护向以保为主、保用结合转变。

记者：合理利用是文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文物利用方面有哪些重要的工作需要加强？

励小捷：就整体而言，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文物合理利用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呈现出积极探索、加快推进的态势。当前，推进文物利用，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抓实抓好。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要尽可能向公众开放。据统计，全国4296处国保单位已接近50%对公众开放，文物系统管理的达到60%左右。2014年以来，为配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先后对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旧址、阜新万人坑等47处抗战类文物保护单位实施了规划编制、保护维修和展示提升工程，文物系统管理的113处抗战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9月前已全部对公众开放。开放是文物公益性的基本体现，也是文物为社会服务的主要形式。推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尽可能向公众开放应当说是不可移动文物利用的前提和基础。

提高馆藏文物利用率，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建立国有馆藏文物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博物馆文物展览质量、数量考核评价制度，切实解决馆藏文物展出率不高的问题，解决新建博物馆藏品不足、展陈难的问题。全国馆藏可移动文物，数量巨大，分布极不平衡。我们对9个央地共建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展出率进行了统计，其中最高的不足5%，最低的仅1.2%，平均不足2.8%。而个别新建的市县级博物馆，馆藏文物少得连一个基本陈列都充实不起来。毫无疑问，提高博物馆馆藏文物展出率，应当说是可移动文物利用的最重要一环。

发挥文物资源教育功能，推出更多展现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品展览展示。博物馆展览中不乏精品，但主要是按照历史和艺术的思路进行策展的。如何依托文物资源，突出时代性，策划出一系列具有鲜明教育作用的主题展览，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近两年，围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开展了展览策划征集，在全国推出了13个具有代表性的展览，比如年画文化主题展、孝文化主题展、诚信礼仪主题展等，让文物说话，讲好中国故事。

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提升展示利用水平。充分利用信息、网络等新技术，创新文物展陈形式和手段，创新文博数字产品传输方式，建立互动体验、即时共享平台，拉近文物与社会大众的距离，积极打造智慧博物馆。

记者：当前的文物工作还面临哪些难题？

励小捷：问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地方田野文物被盗窃、盗掘，文物损毁和流失较为严重。2009年到2014年，全国公安部门共立文物案件（包括盗窃、盗掘、倒卖、抢劫、走私文物等）7176起，平均每年1196起，平均每天发案3起以上。古遗址、古墓葬、田野石刻等成为犯罪分子实施盗窃盗掘的主要对象，犯罪活动呈现出集团化、高科技化、暴力化、盗运销一条龙等趋势。近年来，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连续部署或者指导地方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防范和打击文物犯罪仍然是长期艰巨任务。另外，火灾事故严重危害文物建筑安全，古城、古镇、古村寨和文物建筑群火灾呈上升趋势。2010年以来，共接报文物建筑火灾74起，其中因电气故障引发的文物火灾事故占30%以上。火灾事故给文物造成了严重损失甚至是灭顶之灾。

二是法人违法高发频发。2012年至2014年，国家文物局共接报文物行政违法案件789起，其中，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违法案件146起，法人违法案件高达71%。一些地方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搞违法建设，破坏文物历史风貌，甚至破坏文物本体，一些珍贵的文化遗址、古建筑消失在推土机之下。仅2014年就有四川平武报恩寺、内蒙阿尔山车站等2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保护范围或监控地带内发生违法建设案件。这些案件中大多数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或者企事业单位的法人行为。

三是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加快。《文物保护法》将文物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按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统称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占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总量80%以上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是目前管理上的一块短板，基本上没有进入管理体系，保护资金基本没有渠道。2014年，国家文物局对10个县（区）卫星遥感监测，文物消失率达到4.7%，个别区县甚至达到23.96%。

四是文博机构队伍薄弱。目前，文物行政部门人员编制严重不足，有13个省为处级建制，有4个省的人员编制不足10人。全国45%以上的县、市，包括一些文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县、市，既无文物行政部门，又无在编文物干部。全国各级文物行政执法人员不足千人，只有16个省的文物局设有执法处室。文物保护专业技术人员极为短缺。

五是经费投入仍然不足。总体上看，各级政府对文物保护资金的投入与文物保护需求相比，缺口仍然较大。地方对文物保护的投入偏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严重短缺。

记者：地方政府文物保护的责任，《文物保护法》有很明确具体的规定，那么，如何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文物的保护利用？

励小捷：《文物保护法》对地方政府文物保护责任规定了27条，如果择其要者，可以概括为六项职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应将文物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应将文物保护纳入城乡规划；在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项目应事先征求文物行政部门意见；文物拆除、迁建、用途改变，必须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前必须事先报请文物部门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等等。

（下转8版）

全面从严治党系列③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

□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志明

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管好党。

那么，一个8700多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该怎么管好？这是一个难题。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并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战略部署，强调通过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达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知行合一，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思路。

善于通过从思想上建党，使党成为信念坚定并为人民无私奋斗的党，是我们党的看家本领和政治优势，是党成为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的重要保证，是党赢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拥护的重要品质，任何时候都不能淡化。民主革命时期，通过思想建党，我们党形成了凝聚全党智慧的毛泽东思想，并使其成为了全党上下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行为自觉，培育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生态，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一举变成了具有强大内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

执政以后该如何继承发扬思想建党的优势和传统呢？实践证明，仅仅靠思想建党来治党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治党的支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一靠教育二靠制度的治党思路，并且特别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但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治党的好制度呢？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些新的治党思路又如何才能变成管用的可操作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呢？过去30多年，我们立的党内规矩也不少，但为什么有些规矩不好使呢？比如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问题，比如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问题等。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制度没有最终形成全党的制度文化，没有变成全党同志自觉的行为方式和行为自觉。换句话说，好的制度本身不是我们过去理解的死板的生硬的条条框框，制度也是有灵魂有核心价值的，而且制度只有最终形成了制度文化，才可能起到制度应该有的作用。也就是说，制度治党本身就内含了思想建党的要素。

就制度本身的建设而言，再完善的制度也不可能没有漏洞，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尽量减少漏洞，只能是制定越来越合理的制度。那么，如何对待制度漏洞，就成为制度顶层设计者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其中，着力培育和养成制度文化，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强调制度的思想价值，使这种思想价值尽快成为组织成员的共识并自觉遵守，就成为制度设计者推进的重要目标。因此，切实把思想建党的优势和传统植根于制度建设之中，在制度建设中进一步彰显思想建党的优势，才是党善于领导制度建设的体现。从政党治理成本的角度看也是这个道理，只有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实现了有机结合，只有当党铁的纪律变成了组织成员的内心信念，只有当制度规范和要求变成全党心悦诚服的行为自觉时，政党治理的成本才会很低，成效才会很大，也容易长治久安。

正像习近平同志突出强调的那样，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意义在于以制度化、程序化、具体化方式治理党内政治生活，保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这就使我们党走出一条既靠教育也靠制度的治党新路，通过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之结合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知行合一的理念和制度创新。“知”即从严教育干部，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理想信念教育永远在路上，使全党干部始终在思想意识方面绷紧理想信念总开关这根弦，形成全党同志的内心信念；“行”即从严管理干部，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管好广大党员干部的行为举止，并最终养成全党同志的党内政治生活方式和行为自觉。

如果说治党也是一种修行，那么全面从严治党达到知行合一，则是我们修得的正果。这是党达到更高执政境界的标志，是党对治党规律和执政规律高度自觉的标志，是党在执政条件下逐步走向成熟和有战斗力的标志，其影响深刻而长远。

形有波动 势仍向好

观察员

□ 杨英杰

李克强总理在第九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特别致辞中强调，中国经济目前正可谓形有波动，势仍向好。所谓形有波动，是指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实现制造业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升级发展，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到消费和投资协调拉动的转换，是一个充满阵痛、十分艰难的过程，其间经济增长难免有波动起伏。所谓势仍向好，是指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处在深入推进阶段，蕴含着强劲的国内市场需求，中国经济有巨大潜力和内在韧性，发展势头稳中向好。

《资治通鉴》中荀悦论曰：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实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术不同也。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决定胜负策略的方法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发展趋势，二是相机抉择，三是心态意志。简言之，要成大事者，必须要认清发展趋势，采取灵活措施，心志坚定不移。

结合目下我国现实，所谓认清发展趋势，就是要认清经济新常态下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当前世界经济前景复杂多变，我们在继续保持扩大开放的同时，也要认清开放红利在全球经济环境趋紧的形势下边际收益递减的现实。尤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前景不容乐观所带来的贸易摩擦之增多、国内经济政策外部性之增强，会对中国商品出口以及资本走出去产生相当的阻力。

在此状况之下，必须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立足点依托于国内。对外开放要一如既往，对内深化改革更要砥砺前行。事实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及区域差异所产生的发展压差，如水之就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会引致资本、劳动、技术等自然地符合市场需求地合理转移。这样一个过程，至少会持续一二十年的时间，仍会是一个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大陆内部，会自然形成一个雁阵模式，东部沿海地区在加速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自身成熟的产业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带动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说中国经济具有韧性，就在于中国地域幅员辽阔且产业类型多样，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业不兴那业兴。中国经济的支撑并非独木一根，而是“四梁八柱”，具有很强的抗冲击能力和韧性。

认清了发展的大势，就有了信心和底气。但在处理经济问题的过程中，需要采取更为稳妥的且具灵活性的政策工具。这种工具的使用，必须让市场主体感受到资源的可得性更加便利和公平。比如货币政策的使用，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无论是降准还是降息，不仅要讲究精准性，更要讲究公平性。不能让大部分资金流向对资金成本不敏感的具有垄断性的生产主体，造成资金的沉淀和无效使用。当然，这不仅取决于发放资金的金融企业是否多元化，同时也取决于是否有适当的比如政府贴息之类的政策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的帮助。再比如，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亟需加快推进，以增强企业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还有，在经济预期较为悲观的时候，对处于生产链低端的中小企业采取直接减税或税收减缓征收的措施，当更是及时之雨。

需要指出的是，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各种措施中，我们仍有依赖于大项目甚至超大项目的思维惯性和行为习惯，对于一些润物细无声的政策工具和支持措施有时不大看得上，只是急于通过一些大工程的实施迅速提振经济。殊不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增长之病痛，尚需慢慢调理，是急不得的。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大背景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一剂调理稳定经济“脉象”的好药。

最后还要强调信心的重要性。我们总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当下，更凸显其真理性。此处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切实的措施和效果让市场真正感受到政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毅力和决心。政府要有壮士断腕之勇气，将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彻底推进，将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生产要素领域改革彻底推进，将从严治党依法反腐进行到底；破除与民争利的思想，打破行政垄断，为市场松绑，激活市场潜力。果如此，中国经济前景可期，中国未来前景可期。